

FRONTIERS OF
LITERARY THEORY 12

主编: 王宁



文学
理论
前沿

(第十二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理论前沿. 第十二辑/王宁主编.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ISBN 978-7-302-38570-7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文学理论—文集 IV. ①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3615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 010-62782989 13701121933

责任编辑: 刘琦榕

封面设计: 覃一彪

责任校对: 王凤芝

责任印制: 王静怡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 100084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 北京密云胶印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85mm×260mm 印 张: 13 字 数: 266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定 价: 46.00 元

产品编号: 059625-01

国际顾问委员会

拉尔夫·科恩	乔纳森·卡勒	特里·伊格尔顿	胡经之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陆贵山	J. 希利斯·米勒	W. J. T. 米切尔
钱中文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	童庆炳	吴元迈

主 编

王 宁

副 主 编

徐 剑 生安锋

编 委

霍米·巴巴	马歇尔·布朗	曹顺庆	陈永国
戴维·戴姆拉什	党圣元	金元浦	刘 康
罗 钢	陶东风	王一川	王岳川
谢少波	许 明	周 宪	朱立元

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Ralph Cohen	Jonathan Culler	Terry Eagleton	Hu Jingzhi
Fredric Jameson	Lu Guishan	J. Hillis Miller	W. J. T. Mitchell
Qian Zhongwen	Gayatri Spivak	Tong Qingbing	Wu Yuanmai

EDITOR

Wang Ning

ASSOCIATE EDITORS

Xu Jian Sheng Anfeng

EDITORIAL BOARD

Homi Bhabha	Marshall Brown	Cao Shunqing	Chen Yongguo
David Damrosch	Dang Shengyuan	Jin Yuanpu	Liu Kang
Luo Gang	Tao Dongfeng	Wang Yichuan	Wang Yuechuan
Xie Shaobo	Xu Ming	Zhou Xian	Zhu Liyuan

编者前言

前沿理论思潮探讨

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	王 宁	1
身体、机器与后人类：后人文主义视角下的《救人就是救自己》	肖明文	30
原型范畴、原型和世界文学	李利敏	52

当代西方文论在中国

结构主义的引进与中国本土文学批评理论	封宗信	73
新历史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生安锋	106

文学中的理论性

艾柯的文学符号学理论及其在《玫瑰的名字》中的体现	李 瑾	127
当代科幻小说研究与多丽丝·莱辛	刘 宁	156
作为文学批评家的世界主义者库切	王敬慧	174



CONTENTS

Editor's Note

Exploring Frontiers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ultural Trends

Wang Ning

Marxism and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1

Xiao Mingwen

Body, Machine and the Posthuman: A Posthumanistic Approach to
“The Life You Save May Be Your Own” 30

Li Limin

Prototype, Archetype, and World Literature 52

Contemporary Western Theories in China

Feng Zongxin

The Introduction of Structuralism and Theori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China 73

Sheng Anfeng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New Historicism in China..... 106

The Theoretical in Literature

Li Jin

Umberto Eco's Literary Semiotic Theory and Its Embodiments in His
The Name of the Rose..... 127

Liu Ning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and Doris Lessing..... 156

Wang Jinghui

The Cosmopolitanist J. M. Coetzee as a Literary Critic 174

编者前言

经过半年时间的组稿、审稿和编辑加工,《文学理论前沿》第十二辑马上就要与专业文学理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见面了。我像以往一样在此重申,本丛刊作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的会刊,由学会委托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负责编辑,前几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从第十一辑开始改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目前国际文学理论学会尚无一家学术刊物,而且该学会秘书处又设在中国清华大学(王宁任该学会秘书长),因此经过与学会主席希利斯·米勒教授等领导成员商量,决定本丛刊实际上又担当了国际文学理论学会的中文刊物之角色。自2009年起,由于本刊主编王宁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聘为讲席教授,因而本刊将由上海交大和清华大学两大名校联合主办,这应该说是一种卓有成效的强强联合吧。值得我们欣慰的是,本刊自创刊以来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不仅读者队伍日益增大,而且影响也在逐步扩大。可以说,本刊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第一步已经实现。尤其值得在此一提的是,从2008年起,本丛刊已连续三度被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列为来源集刊,前几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又对各种集刊进行了整顿,一些集刊停止,而本刊则得以幸存,而且自今年起改为半年刊。这些无疑是对本刊的一个极大鼓励和鞭策,我想我们今后的任务不仅是要继续推出高质量的优秀论文,还要争取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

正如我在第一辑编者前言中指出的,我们办刊的立足点是两个:一是站在当今国际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前沿,对当今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提出我们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从今天的新视角对曾在文学理论史上有过重要影响但现已被忽视的一些老话题进行新的阐释;二是着眼于国际性,也即我们所发表的文章并非仅出于国内学者之手,而是在整个国际学术界物色优秀的文稿。鉴于目前国际文学理论界尚无一家专门发表高质量的反映当今文学理论前沿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的长篇论文的大型集刊,本刊的出版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白。本刊本着质量第一的原则,现在改为每年出版两辑,也许今后会出版三辑或四辑。与国内同类集刊或期刊不同的是,本刊专门刊发20 000~30 000字的、既

体现扎实的理论功力同时又有独特理论创新的长篇学术论文 10 篇左右,最长的论文一般不超过 40 000 字。所以对于广大作者的热心投稿,我们不得不告诉他们,希望他们在仔细研究本刊的办刊方针和研读各辑所发论文之后再寄来稿件。本刊每一辑发表境外学者论文为 1~2 篇,视其是否与该辑主题相符,这些论文分别选译自国际文学理论的权威刊物《新文学史》和《批评探索》(主编者拥有这两家刊物的中文版版权)或直接向境外学者约稿。国内及海外学者用中文撰写的论文需经过匿名评审后决定是否刊用。现在每一辑的字数为 200 000 字左右。

读者也许已经看到,本辑与第十一辑的栏目设置有一些不同。第一个栏目依然是过去既定的“前沿理论思潮探讨”。这一栏目的第一篇文章出自本刊主编王宁之手,该文旁征博引,为读者梳理出一条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研究的清晰的发展脉络。作者认为,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等经典马克思主义者都对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如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席勒、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的创作成就发表过许多十分精辟的见解,这些见解无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观的奠基性思想。他们这些零散的思想后来分别由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加以阐释和发挥。虽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关注世界文学现象,但他们往往仅局限于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观作出的贡献,却根本忽视了另外两大块:苏联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世界文学的贡献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作出的独特贡献。而该文在全面综述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研究时,对这二者的建树也作了评论,并对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研究的未来前景作了预测。接下来的两篇论文分别从各自研究的角度对文学理论的前沿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或从今天的视角来重新阐述经典的理论话题。肖明文的文章探讨的是当今文学和文化理论界的前沿课题——后人文主义,但作者并未卷入无端的理论演绎,而是通过对作品的细读和分析来阐述后人文主义批评的特征。该文首先评述了后人文主义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的主要论著,然后解释了后人文主义、后人类和人机合一体等关键概念。在指出后人文主义的主要考察对象是人类主体性的机器性和/或动物性后,该文便着重追溯了有关人类与机器二者之间关系的哲学观点,最后运用后人文主义视角对弗兰纳里·奥康纳的短篇小说《救人就是救自己》加以详细解读。作者认为,这个短篇故事既解释了有机身体与机械身体的融合,又揭示了自然身体与国家/文化身体的关联。奥康纳在文本中传递的信息与后人文主义学者的主张不谋而合,都倡导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平等和谐关系。原型理论并非新的话题,

但作者李利敏所选取的视角还是颇有新意的，她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出发，指出原型范畴理论实际上是一个结构化的、多产的、解释力很强的辩证性认知理论。而文学中的原型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永恒的、形式多样的抽象概念。该文通过对比分析两者的定义、发展和性质，发现虽然原型范畴理论的内涵意义不像文学中的原型意义那么丰富，但是两者的理论基础和认知机制却相同。并且，原型范畴理论不仅在理论层面可以扩展原型的研究范围，并在认知层面揭示原型意义的生成过程，还可以在文化层面上分析原型作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瑰宝的原因。应该说，上面三篇文章所探讨的都与当今学界所热议的“世界文学”话题密切相关，只是各自选取的角度不同。

本辑的第二个栏目“当代西方文论在中国”编发了两篇论文，这两篇都是作者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本刊今后将更为重视发表这方面的成果。封宗信的长篇论文从结构主义在语言学中的源头开始追溯，涉及其在不同的国家和语境中的发展演变，最后归结到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声势浩大的结构主义理论思潮。作者认为，结构主义源于20世纪初的现代语言学，通过不同的发展线索和阶段，成为人类学、社会学、符号学、文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一个理论范式和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方法论。结构主义者旨在揭示人类所有行为后面潜在的结构和关系，认为只有在更大的系统或结构中思考人类文化的要素之间及其与系统结构的关系才能理解人类文化的本质。结构主义在中国由零星介绍、盲目批判到系统引进、接受、应用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和几个复杂的阶段，对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总的来看，结构主义及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引进、应用及本土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它虽然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果，但真正具有国际影响者寥寥无几。这说明，中国的西方文论研究基本上仍停留在评介或“自说自话”的低层次，并未达到与西方乃至国际学界平等对话的境地。同样，在新历史主义研究领域内也是如此，虽然这方面的论文专著汗牛充栋，但稍加梳理就会发现其重复率很高。生安锋的论文为我们梳理出一条引进和发展路径。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新历史主义被引介到中国并在文学批评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国学者除了对新历史主义在英美国家的理论实践和创造加以评介外，还运用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方法，结合中国语境和中国文本、文学潮流等，尝试着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和颇具开拓性的研究，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作者指出，按照所发表的关于新历史主义的论文数量，我们可以粗略地将新历史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引介与发展划分为两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至

整个 90 年代为这一思潮的引进介绍期；进入 21 世纪的十五年为新历史主义的蓬勃发展期。论文最后中肯地分析了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盛行的原因和在中国语境接受过程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认为新历史主义之运用于中国的人文学科研究有着广阔的前景。

接下来的一个栏目就是“文学中的理论性”，这个栏目的设置是受到美国文学理论家卡勒的一本书的启发，那本书的题目是“理论中的文学性”(the literary in theory)。作者试图证明，虽然人们指责当今的理论远离文学，但实际上通过认真的细读便不难发现，这些理论中依然有文学的身影：所举的例证和分析的对象大多是文学，因而文学理论依然没有死亡。同样，在一些有着深厚理论素养的作家那里，文学作品中也不无理论性。这里所发表的三篇以作家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文就试图证明这一点。翁贝特·艾柯被公认为同时在文学理论和实践上都成就斐然的一位大师级人物，但长期以来将他的理论与作品结合起来研究并得出真知灼见者却很少，至少在中国的语境下如此。我们编发了李瑾的长篇论文，该文指出，艾柯认为，较为全面的一般符号学大纲应该包括符号的“谎言”理论，否则符号便无法用以阐明真理，并在此基础上将符号学研究推衍至整个文化符号系统。文化符号学就是文化符号在何种语义场中如何发挥其意指与交流作用。文化单元作为表意符号，本身具有多义性、不确定性和悖谬性。文学表达科学理性的同时也表达神圣信仰。在小说《玫瑰的名字》中，艾柯的符号学理论随处可见，尤其是符号本身包含的悖谬性，这可以说是其符号学理论在文学领域里的延伸和运用；那些涉及符号衍义的推断，成为符号悖谬的绝妙注释。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解读他的小说，可以看出文本中的理性推理与神圣信仰之间或隐或显地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符号悖论。应该说这是作者通过细读艾柯的作品所得出的洞见。刘宁的文章所讨论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的科幻小说，作者认为科幻小说在当代已经进入主流理论家的视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创建了科幻小说的理论框架，从乌托邦写作的角度界定科幻小说的写作，并指出科幻小说只能在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视角下进行创作。莱辛正是这样一位在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框架下进行科幻小说创作的作家。莱辛的科幻小说秉承英国科幻小说的传统，同时也受到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她在科幻小说中构建了一个反乌托邦世界，对文明的终结阶段给予了形象刻画和深度思考。在其反乌托邦科幻小说中，莱辛构建的文明终结景象契合了汤恩比的文明解体理论，表现出汤恩比所设想的对环境能量的丧失、技术的衰退、社会组织的崩坏、战争的频发，以及对原始社会的回归等现象。莱辛的文

学作品中所涉及的理论问题无疑对科幻小说研究有着一定的启迪，并丰富了科幻小说的理论宝库。而王敬慧的文章则试图说明，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也应被看作是一位后殖民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思想就蕴含在他的作品中。作者将库切所发表的具有理论性的文章放在一个批评的语境下来梳理库切的后殖民主义思想体系，并认为，库切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耐人寻味，就在于其中所蕴含的思想与哲学高度，他尝试着超越常规范式进行思考和创作，也体现了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追求：让人的思维去殖民化。而他那些相对不被重视的文学评论所蕴含的思想与文学作品的创作理念则是一脉相承的。本文的重点在于从他的文学作品与文学评论中总结和分析其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想的成因、内质与特色。这些论文的范围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作家作品研究，达到了理论概括的境地。今后我们还要编发这类文章。

本刊的编定已经过了中秋节和教师节，邻近国庆时分，大家都在忙着过节，我在此谨向为本丛刊的出版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人员致以深切的谢意。我们始终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支持和鼓励。

王 宁

2014 年 9 月

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

王 宁

内容提要： 在当今的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关于世界文学问题的讨论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这与全球化对文化和文学的巨大影响与作用不无关系。当代西方学者一般从歌德对世界文学的构想汲取灵感，将世界文学界定为文学的生产、流通和翻译的过程（戴姆拉什）。虽然他们也承认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世界文学的提及对这一理论概念的成型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却很少沿着这条线索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实际上，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等经典马克思主义者都对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如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席勒、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的创作成就发表过许多十分精辟的见解，这些见解无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观的奠基性思想。他们的这些零散的思想后来分别由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加以阐释和发挥。虽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关注世界文学现象，但他们往往仅局限于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观作出的贡献，却根本忽视了另外两大块：苏联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世界文学的贡献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作出的独特贡献。而本文在全面综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研究时，对这二者的建树也作了评论，并对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研究的未来前景作了预测。

关 键 词： 马克思主义 世界文学 西方 苏联 中国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circl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the issue of world literature has become a heatedly discussed topic. This is certainly related to the huge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 on culture and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Western scholars are usually inspired by Goethe's conjecture on world literature viewing it as a process of literary production, circulation and translation (Damrosch). Although they recognize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Marx and Engels to the forma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as a theoretic concept in their co-authored *Communist Manifesto*, they seldom, following this line, explore the irreplaceable contribution of Marxism to the study of world literature. As a matter of fact, Marx, Engels and Lenin have all made many insightful comments on such classical writers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like Dante, Shakespeare, Goethe, Schiller, Balzac and Tolstoy and their literary achievements. These ideas are certainly foundational in Marxist thought on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And their random thoughts have been interpreted and developed by the later Eastern and Western Marxist theorists.

Although Western Marxist scholars also pay considerable attention to the phenomenon of world literature, they are usually restricted to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Western Marxist theorists to the no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while neglecting other two important parts: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both the Soviet Russian Marxists and Chinese Marxists. The present article, after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Western Marxist study of world literature, also deals with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these two groups of scholars. It also predicts the future orientation of Marxist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Key words: Marxism; world literature; West; Soviet Union; China

在当今的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关于世界文学问题的讨论已经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和世界主义话语的兴起而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实际上,世界文学这个话题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而是一个不断被不同时代的人们“建构”和“重构”的老话题。现在这个话题之所以再度引起学界关注显然与我们所处于的全球化时代以及世界主义思潮的兴起不无关系。当代西方学者在讨论世界文学时,一般总是从歌德对世界文学的构想汲取灵感,将世界文学界定为文学的生产、流通和翻译的过程(戴姆拉什)。虽然他们也承认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世界文学的提及对这一理论概念的成型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却很少沿着这条线索去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实际上,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等经典马克思主义者都对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如荷马史诗、但丁、莎士比亚、欧仁·苏、歌德、席勒、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易卜生、普希金、车尔尼雪夫斯基、杰克·伦敦等的创作成就做过许多十分精辟的评点和讨论,其中涉及文学创作的题材和人物刻画、文学批评的美学和历史标准等。这些具有理论洞见的评点性文字无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观的奠基性思想。他们的这些零散的思想观点主要通过书信和作品点评的方式来表达,后来分别由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加以阐释和发挥,逐步形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研究的传统和话语体系。虽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者也关注世界文学现象,但他们往往仅仅局限于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观作出的贡献,而在很大程度上却忽视了另外两部分学者作出的贡献:苏联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世界文学理论与实践的贡献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作出的独特贡献。而本文作者作为近年来一直专事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则不仅要紧密跟进西方学者对世界文学的研究,同时也要关注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研究者对这一理论课题的研究,通过这样的比较,才能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与世界文学

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问题，固然首先要从阅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著开始。虽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世界文学现象十分关注，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德国作家和思想家歌德的世界文学构想的启发。根据现有的研究，人们一般认为，“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一术语是歌德在1827年和青年学子艾克曼谈话时创造出来并加以详细阐释的一个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概念，当时年逾古稀的歌德在读了一些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非西方文学作品后总结道，“诗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这一点在各个地方的所有时代的成百上千的人那里都有所体现……民族文学现在算不了什么，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现在每一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使它早日来临。”^[1] 他在这里以“诗”来指代文学，指出了各民族文学所具有的共同美学特征，特别是涉及了长期以来不为人所知的东方文学，这样便建构出了他的世界文学观。应该承认，就总体而言，歌德的世界文学观仍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或者更具体地说有着德意志中心主义的色彩。但是具有反讽意味的恰恰是，歌德当年之所以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他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非西方文学作品的阅读，今天的中国读者们也许已经忘记了《好逑传》、《老生儿》、《花笺记》和《玉娇梨》这样一些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占重要地位的作品，但正是这些作品启发了歌德，使他得出了具有普世意义的“世界文学”概念。这一点颇值得比较文学学者深思。最近，根据德国学者海因里希·迪德林（Heinrich Detering）等人的考证，歌德实际上并不是第一个使用“世界文学”这一术语的人，早在1810年，克里斯托弗·马丁·魏兰（Christoph Martin Wieland）就率先使用了这一术语，哲学家赫尔德等人也在更早的不同场合使用过诸如“世界的文学”这样的表达法，^[2] 但是今天的学者们都不可否认，歌德是最早将其付诸实践和概念化的思想家和作家。因此他对世界文学的论述至今仍有着最大的影响，而他本人也被看作是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这门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和鼻祖。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世界文学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歌德的这一构想的启迪，只是他们将其作了扩展，从而使得所有人类的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也被包括进来了。

实际上，熟悉欧洲文学史的人并不难发现，早在歌德之前，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国别文学就已经通过翻译开始了交流和沟通。在启蒙时期的欧洲，甚至出现过一個世界文学的发展方向。这应该是文化全球化的早期形式或先声。但是在当时，呼唤世界文学的

[1] 引自 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

[2] 这方面还可参考这两篇文章：Wolfgang Schamoni, “‘Weltliteratur’ — zuerst 1773 bei August Ludwig Schölzer”, *arcadia: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 43.2 (2008), pp. 288-298; Hans-Joachim Weitz, “Weltliteratur zuerst bei Wieland”, *arcadia: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Literaturwissenschaft*, 22 (1987), pp. 206-208.

出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是停留在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和推测阶段。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借用了这一术语,用以描述作为全球资本化的一个直接后果的资产阶级文学生产的“世界主义特征”。马恩在考察了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和发展后总结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多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 马恩在这里是想指出,世界文学的形成自有其一定的规律,它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的生产和流通之产物,与跨国的物质生产和流通密切相关,而且就是它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所以提出上述关于世界文学和文化的观点,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他们一以贯之的世界主义思想相一致的。在《共产党宣言》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在他们合著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世界历史”的概念。据说这是一份经过多次删除、补充、修改和重新誊写的手稿,虽然手稿的主要部分在当时曾送交出版社,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发表,因此它实际上仍然是一份未完成稿。^[4] 即使在这样一部未完成稿中,我们也仍然可以看出马恩的这种世界主义思想,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5]

在这里,马恩试图证明,世界历史的形成也和世界文学的形成一样,取决于不同的民族的相互交流,而闭关锁国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显然是不可能形成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学的。之后,他们又将这种思想用于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从而进一步将世界文学和文化现象的出现当作一种历史的必然。应该说,马恩上述虽然简单但却十分精辟的论述发展了歌德的“乌托邦”式的构想,使之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研究者在讨论世界文学时常常引用这段话,但其内涵和外延却不同于早先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在这里,马恩所说的世界文学较之歌德早年的狭窄概念已经大大地拓展了,实际上专指一种包括所有知识生产并有着全球性特征的世界文化。也就是说,一种具有审美特征的乌托邦想象已经逐步演变成为一种社会现实。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试图证明,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世界市场的扩大,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或文化知识(生产)已经出现。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我们过去只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主要贡献在于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规律,这确实是不错的,但这还不够,我在此还

[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30页。

[4] 参见魏小萍,《〈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两个方向》,《光明日报》,2006年12月11日。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0页。

要进一步推论，马恩的贡献还在于发现并预示了全球化运作的内在规律。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的价值之所在。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运作之规律的发现赋予我们以一种开阔的、超越了民族/国别视野的全球视野来考察世界文学。他们告诉我们，将这一视野用于世界文学的研究，我们就不能仅仅关注单一的民族/国别文学现象，还要将其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下来比较和考察。我们今天若从学科的角度来看，世界文学实际上就是比较文学的早期雏形，它在某种程度上产生自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为了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凸显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作用，我们自然应当具备一种比较的和国际的眼光来研究文学现象，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文学研究中取得进展。这也许正是我们要把文学研究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学语境下的重要原因。

我们通过对文学史上受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重视并评述的经典作家的深入研究和分析，便可总结出这些经典作品形成的历史原因和不可或缺的批评氛围。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本身也是文学的爱好者和批评者，他们有着很高的文学鉴赏力和判断力，而且他们在思考重大历史和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常常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来了解社会，并结合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实践来说明，文学应该反映特定时代的精神，但是优秀的文学应该同时具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才能达到这一效果。针对一些人指责马克思缺乏七情六欲和基本的艺术情感时，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针锋相对地指出，“马克思本人作过诗，写过一篇未完成的诗歌剧，并且留下了大量关于艺术和宗教的手稿。他还计划过筹办一份戏剧评论的杂志，也想过要写一部关于美学的专著。他在世界文学领域也具有广博的知识。”^[6]可以说，马克思对世界文学作品的判断对于后来的世界文学文选编辑者们也产生了导向性的影响。因此我们便要探讨为什么他们会对这些文学作品产生兴趣并加以评点，以及为什么这些评点会对同时代及后代的研究者产生启迪和影响。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欧洲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做过许多论述，例如在谈到荷马史诗时，他们指出，荷马史诗作为古希腊时代特定的产物，是文学史上高不可及的范本。在谈到但丁的划时代意义时，恩格斯提出了极具洞见的看法，认为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和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莎士比亚是马克思十分钟爱的一位作家，在对莎士比亚的创作与席勒的创作进行比较时，马克思毫不犹豫地指出，自己更加偏爱前者。他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偏好，认为文学创作应遵循一种“莎士比亚化”的美学原则，也即意识到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结合，而不应当像席勒的创作那样仅满足于做时代精神的简单传声筒。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已经自觉地用“莎士比亚化”作为评价优秀的文学作品的标准之一。即使对歌德这位伟大的作家和世界文学理论

[6]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127页。

的奠基人,他们也作了辩证的评论和分析,将其人格上的弱点与其伟大的艺术成就加以区别。这一点有助于我们今天重新认识歌德对世界文学的理论化所作出的奠基性贡献。

19世纪欧洲的现实主义文学曾强烈地引起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关注,尤其是恩格斯,针对巴尔扎克创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他认为,他从巴尔扎克的作品学到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知识比从所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那里学到的知识还要多。他们对挪威的易卜生的戏剧创作以及英国出现的一批现实主义小说家,如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姐妹等,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就此阐述了自己关于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一些看法。他们在不同的场合发表的这些言论和文字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研究这些作家作品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均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可以说,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些零散的论述的影响和启迪下,苏联和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者才把上面提到的一些作家当作自己所认可的世界文学经典作家。此外,这也正是为什么在苏联和中国,被当作世界文学经典的作家与西方学界所选择的经典作家有所不同的原因所在。

如上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少书信中对欧洲文学史上的一些经典作家作了一些评点,应该承认,由于他们的独特鉴赏力和判断力,经过他们评点的作家确实有很多已经成为今天的世界文学选集编者所首选的作家和作品。但是马恩对世界文学研究的贡献还不止于此,他们对一些文学理论批评的基本问题也作了阐述,这些论述也完全可供我们今天在从事世界文学研究时参考。例如,关于悲剧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给费迪南·拉萨尔写过多次书信,并就他的历史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所表现的悲剧主题提出了尖锐和中肯的批评意见。马克思认为,济金根的覆灭“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他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7]恩格斯也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意见,在他看来,

悲剧的因素正是在于:同农民结成联盟这个基本条件不可能出现;因此贵族的政策必然是无足轻重的;当贵族想取得国民运动的领导权的时候,国民大众即农民,就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于是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8]

这些具有理论洞见的观点对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阵营里出现的关于美学和理论问题的讨论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说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世界文学的研究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们的不少理论洞见至今仍为当今的世界文学研究者所引证和讨论。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他们的理论遗产已经由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学者继承了下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3-554页。

[8] 同上,第560页。

来，并作了不同程度的阐释和发展。下面我将分别评述并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研究在三个不同的语境下的发展演变及各自的代表性成果和特色。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研究

长期以来，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西马非马”，也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能算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理由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观察事物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的准则，而只是将其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也即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仅仅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众多哲学流派之一。另一个理由则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注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马克思的学说，而非在此之后作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的学说，因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近几十年来，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超越了早期的这一局限，例如他们对全球化和世界文学的研究就从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开始，并能结合当代的新形势作出独特的分析，从而在一个新的形势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方面说明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在发展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在文学理论界形式主义甚嚣尘上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毅然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强调文学批评的历史性和意识形态倾向性，等等。此外，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的话，那我们就应该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学说的阐释的合法性和作出的独特贡献。因此至少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应该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部分。承认这一点，我们就应该进一步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部分观点，将其运用到世界文学及其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上，提出了一些具有理论洞见的观点，对于反拨形式主义的“非历史化”和“非社会化”批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世界文学理论本身提出建树者并不多，但是几位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及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所作出的贡献却为这门学科以及这个话题在当今的再度兴起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研究，国内的介绍并不多，而且实际上在西方学界这方面的著作也确实不多。在中文的语境下迄今能够见到的唯一一本将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独立话题来研究的学术专著只有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希·萨·伯拉威尔的著作《马克思和世界文学》，该书原文出版于1976年，中译本出版于1981年。这本书主要评述了马克思本人对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些优秀作家和作品的评论，出版之后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评价。但是该书并没有将世界文学当作一个理论概念来研究，因此该书对目前国际学界的世界文学研究基本上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甚至今天的世界文学研究者都很少引用这本著作。但是应该承认，该书依然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也即马克

思对文学的关注并非孤立的,而是与他对他所处于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尽管马克思主要作为一位思想家和哲学家,并没有写过一篇正式的文学批评论文,但他的那些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著述中却可以不时地见到他对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真知灼见:

文学点缀着他的个人生活和私人事务;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到文学作品的地方比比皆是;在他早年当记者的时候,文学成了他有力的战斗武器;随着他自己的世界观逐渐从早期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混合物中演变出来,他就开始借助文学来证实和提出他的新观点;[……]晚年的马克思则经常从文学作品中寻找精神上的支持、游戏的材料、论战的弹药。他精通古典文学,从中世纪到歌德时代的德国文学,但丁、波雅多、塔索、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的作品,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法国和英国的散文小说;任何当代诗歌,凡是能够有助于破坏传统权威和引起对未来的社会正义的希望,的,[……]他无不感到兴趣。^[9]

除了叙述马克思生前对文学的论述外,波拉威尔还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世界文学之于当今时代的意义作了颇有见地的阐述:

在我们现在的二十世纪,通过翻译、纸面书籍普及本、巡回演出、广播、电影和电视,以那些不会使马克思感到吃惊的方式改变了我们的文化视野,我们已看到“民族的与地方的”文学的混合和世界范围的传播。作为一个庞大想象丰富的博物馆,一个伟大的巴贝尔图书馆,“世界文学”猛然到来了。^[10]

如果说,在评述马克思本人对世界文学的阅读和评点时,伯拉威尔还有着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的话,那么在讨论 20 世纪后半叶的社会和文化现实时,则是马克思本人无法经历的现实,因此他的这本书的价值便在于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解释当今的社会文化现实。他在书中试图强调的是,马克思本人虽然没有预见到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因而也没有预见到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文学状况,但是马克思却根据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对当今时代的一些症候作了准确的预示。确实,由于生产和流通工具的发展和更新,文学的生产和流通也大大地便捷了,这就导致文学的传播也扩大成了一种世界的范围,而非像过去那样仅局限于特定的民族和国别。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就有着很大的空间。比如前面提到的这种后工业社会的文化和文学状况就很符合世界文学在当今学界的兴起之内在逻辑: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加速了各民族文化和文学的交流,今天文学的生产和流通并不仅局限于在本民族和本语言,而是跨越了民族/国别的界限,同时翻译的中介也使得世界文学可

[9] 希·萨·伯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梅邵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537-538页。

[10] 同上,第194-195页。

以旅行到世界各国，文学的读者已不局限于同一民族/国别和语言的读者，而是全世界范围的读者。对于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说，他们所据以考察和分析的文学作品也应该是全世界的优秀文学作品，这无疑超越了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欧洲中心主义”之局限。

我们都知道，在欧洲诸国，英国有着悠久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的不少著作都是在大英图书馆撰写的，至今在英国的大学中仍有相当一批学者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雷蒙德·威廉斯和特理·伊格尔顿两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和最有影响力的人。他们都是文学研究者和文学批评家，他们虽然没有专门对世界文学问题作过全面深入的研究，但他们对一些理论问题的思考和论述却为世界文学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的第一章“基本概念”中就从考察本民族的文学——英国文学史入手，指出，

关注文学史，纵览那卷帙浩繁、门类复杂的文学系列（从威尔士早期传说故事集《马宾诺吉》到乔治·艾略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或从弥尔顿的《失乐园》到华兹华斯的《序曲》），往往会导致人们（在文学概念上）某种暂时的踌躇，但当与这种概念密切相关的多种范畴诸如“神话”、“传奇”、“故事”、“现实主义小说”、“史诗”、“抒情诗”、“传记”等全都一一出现、各就其位之后，这种踌躇便消除了。^[11]

虽然威廉斯的关注对象主要是英国文学的优秀作品，但这些作品同时也是世界文学经典作品，它们的意义和影响早已超越了英语世界的疆域而进入到了整个世界性的文化语境，因此他提出的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也就照样适用于别的民族/国别文学的研究。此外，威廉斯在撰写《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这部近乎“纯理论的”学术专著时，还造访了西欧、北美和一些亚洲国家，考察了那里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和研究现状，以便提出具有相对普世意义的文学思想。基于对马克思原著的广泛阅读，他发现，“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在关于语言本身的理论上却贡献甚微”，^[12]因此他从这里出发，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的重要思想，并使之贯穿全书始终。我们若从他的这部著作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接受情况来看，他的这一目的可以说基本上达到了。

世界文学真正作为一个具有学术性的理论课题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关注则由于另一些学者的推进。在这方面，意大利裔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比较文学研究者弗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的贡献具有奠基性的意义，他对世界文学现象始终保持极大的兴趣和关注，并对这一理论课题在当今的再度兴起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他虽然未出版单本的世界文学研究专著，但他所发表的关于世界文学的一些系列论文已经成为

[11] 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8页。

[12] 同上，第19页。

当前的世界文学研究者无法绕过的经典著述。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Fredric Jameson) 这位在中国有着很高知名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近十多年来也开始关注全球化与文化问题, 并涉及世界文学和文学史的写作, 他对中国小说家鲁迅和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解读和分析实际上也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 而他本人也十分关注文学史的写作和世界文学的兴起。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荷兰比较文学理论家和汉学家杜威·佛克马 (Douwe Fokkema) 除了在自己的理论著述中对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和中国的接受有较多的论述外,^[13] 他本人对世界文学以及文学经典的形成与重构也提出了不少富有理论洞见的见解。毫无疑问, 上述这些学者关于世界文学和文学经典问题的著述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研究, 为我们今天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 我们前面提及的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构想开始时只是一种具有乌托邦色彩的世界文学的话, 那么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 随着全球文化和世界语言版图的重新绘制, 世界文学已经成为一个我们无法否认和回避的审美现实: 通过翻译的中介, 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多个国家和不同的语境下广为流传; 一些具有双重甚至多重国籍和身份的作家在一个跨文化的语境下从事写作, 涉及一些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 文学研究者自觉地把本国的文学放在一个世界性的语境下来考察和比较研究, 等等。这一切都说明, 在今天的语境下重新强调世界文学的建构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此时的世界文学之内涵和外延已经大大地扩展了, 它逐步摒弃了早先的“乌托邦”色彩, 带有了更多的社会现实和审美意义, 并且对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和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和启迪。

由于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局限于欧洲语境下并且仅为少数精英学者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所使用, 因而早先的世界文学史就成了欧洲文学的有限拓展版。正如佛克马所注意到的, 当我们谈到世界文学时, 我们通常采取两种不同的态度: 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普遍主义。他在讨论欧洲中心主义者对世界文学的绘图时指出:

雷蒙德·格诺 (Raymond Queneau) 的《文学史》(*Histoire des littératures*) (3卷本, 1955—1958) 有一卷专门讨论法国文学, 一卷讨论西方文学, 一卷讨论古代文学、东方文学和口述文学。中国文学占了 130 页, 印度文学占 140 页, 而法语文学所占的篇幅则是其十二倍之多。汉斯·麦耶 (Hans Mayer) 在他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 (1989) 一书中, 则对所有的非西方世界的文学全然忽略不谈。^[14]

[13] 这方面可参考佛克马、易布思著,《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年出版) 中的有关章节。

[14] Douwe Fokkema, "World Literature", in Roland Robertson and Jan Aart Scholte eds.,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7, pp. 1290-1291.